

反宰制、抗辩与主体性追寻

——论陈映真小说的身体书写

马海洋

内容提要 文学中的身体隐含着丰富的话语内容，在历史、政治和时代的耦合中传达着作者的心灵情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台湾，掌权者对于身体进行多维宰制，以此实行规训与意识形态管制，压制反抗者。陈映真小说通过对身体的书写解构政治和资本的管控，穿越意识形态的遮蔽，以“反宰制”和“去蔽”的方式对抗权力凝视。他借助身体表征出的“爱欲”与“自戕”的复合渗透，以积极和消极的身体革命演绎思想的革命，冲破威权时代辖制。由“身体”到“心灵”的演进之中，陈映真小说立足于文化启蒙、左翼信仰与“内战—冷战”三个维度探寻主体性，主体性确立后指向三个重要关节点即个人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

关键词 身体书写；反宰制；爱欲；主体性

身体作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内容，置身于时代的话语场域中，产生意义的增殖而不再是自然性的存在。身体作为一种指号，是“永远具有隐含的所指”^[1]。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政策收编身体，对于身体的期待想象被统摄于巩固统治的策略之中。自 1959 年的《面摊》开始，复杂的身体话语出场并贯穿于陈映真各阶段的创作中，其笔下的身体既刺破生活雾障、穿越历史遮蔽，又投射爱欲并体现隐含作者内心的“感觉结构”^[2]。陈映真借身体陈述青年的理想沉沦、制度的重压与社会的黑暗，迎击台湾日据时期的殖民压迫、追溯白色恐怖的隐秘历史、披露全盘西化的扭曲风尚和跨国公司的资本罪恶。《故乡》《死者》《猫他们的祖母》中丰腴或壮硕的身体、《我的弟弟康雄》《凄惨的无言的嘴》《苹果树》中细瘦而苍白的身体，以及《累累》《第一件差事》中裸露的身体，皆以回到本真状态的方式，展现身体原初的“自主性”的力量，在与现实的关系重建之中穿透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回归真实的血肉之身。陈映真的小说摒弃了柏拉图式“灵魂/身

体”的二元论划分（其中前者对于后者具有绝对优势），而接近于“尼采式”的身体，摆脱意识形态对于身体的束缚，进而由“身”到“心”寻觅主体性。身体具有极端的自主性，并可以冲破权力、历史和资本等对人的定型和管制，被用以对抗台湾威权时代的严厉高压，还击意识形态对思想的绝对整肃。本文探究身体这一符号在台湾特定历史时期，官方政策导向下所带有的建构性倾向，以及随之被负载的策略性意义。陈映真小说的身体书写对权力附加的含义“翻转”后，体现出对于当时国民党政策的隐性反抗，并带有反宰制的意味。在威权压倒一切的台湾场域，陈映真在身体衍生出的爱欲所在处解构国民党官方儒学体制，以“爱欲”与“自戕”的复合渗透^[3]进行“思想的革命”，借身体隐晦诉说左翼心事。于彼时处于铁屋子似的台湾，身体的出场与爱欲的表达便成为于“无物之阵”中的隐形抗辩。进一步地，陈映真在文化启蒙的诉求、左翼理想的信仰以及“双战”构造^[4]的三种维度之下，探求人物主体性并对台湾现实处境加以影射，主体性探寻最终指向个人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

一 身体的出场：“宰制”与“反规制”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保证在台统治的安稳性，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加以全新形塑，建构并遵奉保障统治稳定的“道统”和“法统”。其中，对于身体的收编和改造成为重要的运作方式之一。身体既成为当权者干预的对象，被赋予一种社会想象，也成为反抗者陈映真表达意志的载体和抒发抗辩的中介。

在50年代之后的台湾，掌权者管控民众认知，维护思想一统，清除异样声音，此为陈映真成长年代的主流环境。政治上的威权体制利用权力对民众身体进行规训，如以“死刑”“有期徒刑”等律令中设置的惩罚措施，处置身体和肃清异议^[5]；文化上，建构官方儒学，推崇传统人伦，如仁义、尊师、孝亲，实际是以儒家的修身之义凝视民众身体，进行身体和思想统筹；在教育上，党部进入校园，军事教官管理党务、进驻宿舍并对学生进行生活辅导，以“中央集权的教育政策和人事法规来驯化大学的‘不安分’”^[6]。身体被掌权者制定的各项政策予以宰制，个体身体被赋予社会责任、“被”笼罩意识形态并成为不自由的存在。

陈映真生于1937年，成长年代身处上述体制所连接成的网格之中，“戒严令”连同相应的管制条例一道形塑了台湾社会的压抑样貌。掌权者对于身体的矫治、规训、惩处，令他惊心动魄。故在回忆创作历程的《后街》中，充满了身体被伤害、屠戮和教化的记忆^[7]。少年时代陈映真所目睹的是“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8]。强权对于身体屠戮的创伤性记忆铭刻于心灵之中，在写作中他令身体出场与时代的限制颀颀，便已显示出对记忆的反叛与救赎。20世纪60年代，以陈映真为中心的地下读书会吸引一批左翼知识分子，读书会的存在既挑战了彼时的政权体制，又因涉及左翼知识与传递进步思想，不容于台湾当局。1968年“台湾民主联盟案”发生，警总以“叛乱案件”之名对其提起公诉，罪名为“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9]。陈映真身体遭遇监禁并被剥夺自由的现实，使他加深了权力对于身体宰制的认知，身体

由此成为参阅历史的坐标。“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本身的血肉。”^[10]文明世界中的身体处于权力规训之下，被给予严肃的控制，并以此延伸至对心灵和思想的控制。陈映真的创作始于1959年的《面摊》，身体于此种语境下的出场，便承载了隐秘的现实意义，被统摄于陈映真不同创作阶段的核心主题词之中。身体是社会现实的微型景观浓缩和政治演武场，也成为解构威权和洞穿现实的中介。陈映真的小说解构掌权者“价值化”身体的运作，对权力的“宰制”进行“反宰制”，并使身体回归本真存在。台湾历史上的岛内戒严、清除左翼和白色恐怖乃至全盘西化等事件成为不断复现在其小说中的梦魇，身体便是他诉说梦魇与切入现实的“原质”^[11]，陈映真得以披露台湾社会现实、触碰被遮蔽的禁忌并呈现创伤记忆。

“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12]肉体或是身体成为与现实相关联的中介。陈映真小说中的身体缠绕着复杂的政治和阶级等话语内容，所指向的主体性存有意义并不相同。前期小说中的身体负载着对政治与战争宰制的反叛与反思，后期小说中的身体则成为批驳资本主义大潮下物化生活的路径。创作前期，面对彼时台湾政治对于身体的宰制和操控，陈映真以身体书写施加解构的反向作用力。《面摊》对底层小贩艰苦生活的叙述，却贯穿了对于母亲身体的描摹。身体的初次登场显示的并非仅是沉重的生活重负，而是在对女性细腻脖颈的描绘中，返归了人类原初的身体美学。“妈妈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一面扣上胸口的口子。街灯照在她的脸上，也照着她优美的长长的颈项。”^[13]身体的呈现带有魅惑性意味，逃逸于社会规则的条框压制，祛除了身体上交织的多种缠绕话语。“在意识形态话语中，身体的感性和个人性意味着一种危险，会对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稳定、有序的结构造成干扰和伤害。”^[14]《面摊》中对于感性身体的“反规制”呈现具有症候性意义，是为陈映真迈向反抗威权政治的第一步，成为陈映真小说抗辩诗学的核心生发点。在高压的年代，身体去蔽与回归自然便也是人之回归本真。对于权力话语的抵抗自此种感性身体的回归始。陈映真借身体书写

勾连社会现实以达成暴露和批判,《家》中以异变的身体透视压抑的社会,台湾的联考、兵役制度与困苦生活对于身体进行重重宰制,丧父而在众人期待目光中落榜的“他”以成人性的笃定姿态支撑起家庭,而夜晚身体“止不住卷成一只虾的姿态”^[15],则是真实心灵状态借身体的表露。这种“物种拟态”式的身体描写披露人物内心的精神状貌,身体成为传递内心伤痛的媒介,进一步展露贫困的重负、看客所给予的压力。身体在家族、教育、现实生活等统辖下成为失却自我意识的存在。身体的出场牵连出人物心灵秘史并通向对于战争的反思,《乡村的教师》中战场还乡的吴锦祥为“一个矮小,黝黑的(当然啦)但并不健康的青年。森黑森黑的胡髭爬满了他尖削的颊和颌”^[16]。身体存有状态被展示并披露战争的戕害,在摆脱殖民的兴奋广场气氛中,昔日的左翼信仰复归,并产生“对于祖国的情热”^[17]。在过去的战乱和现在的生活中有感于改革社会的艰难,吴锦祥在放逐身体间成为一个“堕落了改革者”^[18],并以自杀祭奠无法实现的理想。“门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衬着错杂的胡髭、头发和眉毛。无血液的白蜡一般的脸上,都显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深深怀疑的颜色。”^[19]吴锦祥自杀后身体的“怀疑”神色正是对于战争暴力机器的凝视。陈映真以身体为路径重新反思战争,以自杀式的身体陨落对抗权力干预并谋取自由。在以政治教化操控身体的台湾,陈映真祛除了身体之上的附加因素,赋予身体强烈的反抗性,突破了礼教、政教的多种管辖,并借由身体反思台湾的社会问题,前期小说对于政治和战争“宰制”身体的“反宰制”书写,使身体回归自然性的存在,在感性呈现中使身体和现实世界建立起参照式的同构关系,体现出隐含作者以身体为原点对于台湾现实情况的揭露和去蔽,并建立起初步的抗辩机制。

陈映真借助身体出场“叙情”,感性身体背后的心灵情感为其关注的核心。后期小说对于身体的关注随台湾形势之变而跃出了权力宰制的范畴,以切入台湾现实语境的方式思考资本主义对于人的物化与异化,以及左翼的生存命运,并以身体为中介抒发抗辩。“对身体予以重视不仅由于身体是一个需要被言说的对象,而且也由于身体是一个表

达意义的载体,即作家可以通过身体的象征性和隐喻性间接地表达意义。”^[20]《夜行货车》中林荣平和詹亦宏是一体两面:出身台南农家的前者早已在跨国公司的体制下,身体完全地服从于资本主义体制,后者则“一头经常零乱的长发,肩膀出奇地宽阔”^[21]。在美资公司的资本倾轧中,詹亦宏充满野性的身体内含了叛逆性的力量。“他的荒疏的、带着些野蛮的忿忿的脸,他的出奇地宽阔的肩膀,他的敞开的领子和不礼貌地松开的领带,构成不可言语的魅力。”^[22]充满野性的身体在刻板化和程式化的美资公司中,以冲破束缚的发声姿态反抗资本主义宰制。陈映真后期小说借身体反思资本物化之时,也对于左翼过往加以观照。《铃铛花》作为陈映真“重访左翼”之作,以身体的受辱与反抗描绘出20世纪50年代台湾左翼者的伶仃命运。因政治迫害藏于深山的高老师,“脏脏的长发,深陷的面颊,凌乱而浓黑的胡须,因着消瘦和污垢而更显得巨大、散发着无比的惊恐的、满是血丝的眼睛”^[23]。师生相遇之时经由学生视角所呈现的高老师身体,遍布着台湾当局政治压制下的创伤痕迹。此种身体的存有状态,显示出50年代台湾左翼者对于当局权力宰制的抵抗。左翼理想在资本主义驯化的台湾现实下的式微命运,在《山路》中得到探讨。《山路》中蔡千惠以自虐的方式使身体萎顿,“他为伊拉起压在右臂下的点滴管子,看着伊那青苍的、满脸皱皮的、细瘦的脸上,渗出细细的汗珠来”^[24]。蔡千惠的身体自损实则作为一种面对过往的忏悔,以及对于按照“体制所规定的渠道才能换取脱离贫困、苟且偷生”^[25]的生存现实的逆反。她以身体的自我放弃实现了对于昔日权力宰制的抵抗。面对前后期不同的历史语境,陈映真以身体介入现实问题,并显示出强烈的反抗性意味。

在陈映真笔下,身体以感性的方式回归,有疼痛触感亦有变异样貌,在鲜活肉体处折射出台湾的诸种问题,陈映真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认为:“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者有密切的关联。”^[26]陈映真处于戒严体制和威权时代,无法对于现实进行直接的反拨或批判。面对权力、资本等对于人的“宰制”,借助于身体这一为掌权者所建构和形

塑并承载其意志的存在体，陈映真以“反宰制”和“去蔽”的方式对抗权力凝视，穿越意识形态的遮蔽。从掌权者施加权力运作的纽结点也即“身体”处予以拆解，并躲避层层检查，偷渡自己的叛逆思想。借由身体这一感性路径表达反叛，便成为陈映真小说潜文本的重要指涉和精神关节点。

二 “抗辩”机制的生成：爱欲与自戕的复合渗透

陈映真借助身体抗议权力凝视，并以身体的革命替换在台湾无法真正发生的左翼革命，这与彼时台湾社会进入“革命退场”的冷战时代后，左翼者的革命情绪饥渴症密切相关。50年代之后，台湾左翼文学在肃清的白色恐怖之下成为“被压抑的在野文学力量”^[27]。从早期作品中隐晦的左翼倾向表露，到后期“阶级”“劳工”等议题的直接出场，陈映真小说的左翼烙印在创作演进中不断清晰，左翼作家身份明晰化的过程，便也是借由身体书写而抵达“抗辩”机制的生成过程。这注定与台湾政治掣肘下的社会主潮之间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逆差。在他成长的50年代，伴随戒严而进行的“文化清洁运动”及“禁书运动”皆视左翼思想、共产主义为红色的禁忌。陈映真所秉承的左翼理想无法明朗地现身，而处于喑哑与失声的状态之下。他借由身体衍生的“爱欲”与“自戕”复合渗透的文本模式，致敬其阅读史中的茅盾等人“革命+爱情”的左翼小说创作，又以此模式冲撞台湾官方管控。50年代之后，台湾当局宣扬传统伦理，自我标榜为正统，并以官方儒学中君臣父子观念所蕴含的等级与服从思想进行社会管控。对于身体的想象与期待被统摄于“禁欲”“积极”等教化系统之中。当时台湾的教育政策也为配合局势，颁订相关法规与训练纲要，“通过体育课程以强健体魄，并启发学生尚武精神”^[28]。对于身体体格的检查手段和“集体化”身体的意愿，体现出对于身体的管控和操纵，以及对身体正向性价值的强调。陈映真在被管控的身体处寻找罅隙，并以此作为触发反叛情感的关节点，身体便成他在左翼喑哑的语境下隐秘发声的装置。

在经由身体出场召唤感性的力量，并将权力对身体的束缚予以解绑之后，陈映真又在身体之上投射爱欲。其笔下人物在理想失落之后或沉沦于爱欲或走向自戕，潜隐着拆解官方儒学管控的话语症候，这种写法贯穿于其创作的始终。在陈映真笔下“理想+爱欲”的写作模式中，“理想”为彼时台湾无法现身的左翼政治的隐晦“同位语”，几近于对大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革命+爱情”的复现和改写。在台湾场域中，此种文本形式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指向性和隐喻性意义。在台湾“道统”与“法统”教化体系的双重束缚之下，身体被操纵成为矛盾聚合点，“身体革命”是面对强权之时一种隐匿的想象革命的方式。当理想受挫、精神迷茫之时，投身于爱欲便成为一种自我放逐与救赎，爱欲与台湾官方儒学礼义教化所要求的自我约束相抵牾，并成为一种溢出管制的叛逆性情感。在爱欲现身之处却又常常勾连出青年理想失败后的自杀，“爱欲”和“自戕”复合渗透下的形式和内容的耦合，时时召唤着左翼的幽灵，呈现出浓厚的虚无和忧郁的美学。“忧郁这类情感结构一定程度上溢出了国民党当局为文学设定的精神阀限，因而它本身也意味着某种政治态度和立场选择。”^[29]由身体内在精神质素所传递出的忧郁情感成为陈映真抒发抗辩的关键点。由此，陈映真的左翼理想得以部分地现身和留存，并显示出另类的决绝反抗，这也是在左翼失声于台湾和威权控制的年代，经由文学而达成的压抑性心理的释放。

由爱欲所促生的“青年虚无式”的沉沦，实际内置着强烈的“身体革命”的反抗意愿，只有身体陨落，精神才能自由。对于陈映真，“虚无是一种启蒙”^[30]。拟想的革命和思想的启蒙互相促进，并冲破台湾官方儒学所推崇的敦厚平和的处身之则，成为陈映真表达反叛的精神性基底。爱欲为陈映真表达反叛情感的一翼，而自戕则为另一翼。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曾指出：“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31]青年自杀是在社会压力和冲击之下的决绝反抗。《我的弟弟康雄》中康雄之自杀，貌似是悔恨自己的情欲耽溺，实际上，台湾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压力难辞其咎。自杀并非软弱的行为，而传

递出青年由解除肉体束缚而意欲进行反叛的意愿。“并不丰满的康雄形象，打开了一个为 1950 年代白色恐怖所截断的、青年反叛者的精神谱系。”^[32]在表层文本中，康雄因自己沉沦爱欲而产生负罪感所引发的自杀，在潜层文本中则为隐含作者所赞同，隐含作者借康雄姐姐充当叙述人，将耶稣的雕像和弟弟的身体混为一谈，“因为对于我，两个瘦削而未成熟的胴体在某一个意识上是混一的”^[33]。小说通过身体的“神圣化”解构了弟弟曾失去童贞的负罪感，而使欲望得到升华，康雄曾经有过爱欲的身体便被赋予高贵、纯洁、静穆与纯粹的宗教性的神圣意味。身体的死亡并非完全的陨灭，而被引申至精神的反抗和再生，借爱欲和自戕进行的“身体革命”被不断的复合叠加书写，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愿。陈映真不断地解构台湾当局对人的身体“禁灭爱欲”“谨小慎独”的策略性建构，以此不安定的身体冲击所谓的礼乐大同社会拟想。《某一个日午》中，陈映真通过“小亭子间”和“列宁式的胡子”确认了昔日房处长的左翼身份，儿子房恭行在走向左翼之时，感知到目前生活的虚假性。他对下女彩莲的爱欲与其说是如他信中所言受到了诱惑，毋宁说是他受到了彩莲凡俗肉体所代表的身体符码的召唤。经由和这样的身体的结合，房恭行得以叩访逝去的年代，减轻自己所受到“组织性欺罔”的罪恶，并穿越台湾政策阈限的“窄门”。房恭行式的自杀展现出台湾年轻一代左翼者抗争的悲剧性，孤独者/异端者的爱欲和自戕交缠下的复杂心理结构，展露出深沉的焦虑感。如马尔库塞所言：“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上，爱欲的解放必将成为一种致命的破坏力量，必将全盘否定支配着压抑性现实的原则。”^[34]身体与爱欲的交织书写所蕴含的情感触及了官方政策的界限，但在表层并未直接冲撞官方体制，存在着可回旋的空间。如此，借由身体书写所传递的隐秘教诲实际为一种欲说还休的“隐微写作”^[35]。借此文本形式与内容既可看到陈映真冲破台湾社会法统和道统限制、解构身体的正向意义附加，又可洞察他拒绝台湾当局对于身体的制度性凝视与支配，并借爱欲和自戕进行身体革命，抒发压抑情绪的潜在心理，并进一步地表达了反叛的意愿。

“台湾当局一句‘戒严’，从此限制了人民生活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并借此镇压民众的反抗。”^[36]陈映真以爱欲的释放和自戕演绎身体的革命，直面台湾长期延续的威权政治，偷渡处于暗处的左翼理想。《赵南栋》《山路》《铃铛花》作为其后期“重访左翼”之作，充溢着丰富的身体符号。同样经由爱欲的沉沦书写人物的焦虑与不安，此处则是只有身体沦落，精神才能麻木。作为左翼第二代，如果说此前房恭行式的自杀是积极的身体革命，那么《赵南栋》之中赵南栋式的堕落则是消极的身体革命，而“忧郁”是积极和消极两种态度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内核。作为左翼之子的赵尔平和赵南栋悖逆于左翼父辈的精神线路，前者极力追求物欲的生活，后者则在不同女性之间周旋。赵南栋对于爱欲的沉沦以及追求感官享乐的背后，是对于童年时代环绕梦魇的惊惧。疯狂地寻觅肉欲的享乐，带有死亡的颓废气息，为内心空虚与烦闷的征兆之一。虚无地沉于爱欲是赵南栋无力面对现实的自我逃避，也是陈映真借由身体表达出的与权力的对撞，掺杂着左翼者的自我独白。身体的革命呈现出一种自虐和自苦，《山路》中的蔡千惠混杂着对于李国坤的爱欲和忏悔，而以身体受苦的方式达至另一种补偿，在李家她以近于身体自虐的方式寻找救赎，“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的，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37]。身体的自我奴役是蔡千惠作为潜在左翼者的革命方式。她的崩溃和委顿死亡为另一种自戕，以身体的消逝实现了对于黄贞柏的赎罪，是在台湾物化社会的大语境中对于左翼的忏悔。借“爱欲”与“自戕”复合渗透所进行的身体革命，瓦解威权政治的束缚并延续左翼理想，成为陈映真小说中一条抗辩性的精神线索。

钱理群指出陈映真的基本信念为：“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健全发展，‘使奴隶成为人’，为此，必须抵抗一切‘奴役的力量’。”^[38]陈映真借身体书写使人物回归本真存在，突破困厄现实的阻挡，在身体之上寻找罅隙灌注叛逆精神，正是借助文学想象革命和演绎革命的方式。积极的身体革命与消极的身体革命皆是从心灵内部生发出的抗议。《后街》中提到：“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

虑和孤独。但创作却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39]陈映真化名许南村的这段夫子自道，表明其借文学抒怀和思考乃至干预世事的想法。他选择被附加话语缠绕的“身体”为中介，以爱欲和自戕冲击权力对于身体的凝视，并以此为暗道隐秘行至左翼，借小说中人物“身体的革命”进行了一场在台湾无法实践的左翼思想革命。作为心理机制的补偿性投射，“爱欲”与“自戕”复合渗透的文本形式为陈映真借助于身体“想象革命”的方式。终极的理想则是抵抗一切压迫或奴役人的力量，借由身体革命寻觅人之主体性，以达到“立人”与“解放”的目的。

三 由身到心：三种维度下的 “主体性”思考

陈映真认为：“在台湾的现代中国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现代文学一样，是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40]这段话指明在台湾地区的现代中国文学之负载任务的同时也复现了台湾在历史中的遭遇。帝国与殖民压迫以及光复后长期的威权时代使台湾的精神主体性处于缺乏的悬置状态。陈映真对于台湾精神主体性的探寻落实在了小说中的生命个体之上，又因台湾文学所面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启蒙等问题，而使主体性追寻呈现为三个不同的维度。

从文化启蒙的角度来看，陈映真在小说中对于主体性的探索与五四启蒙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主体性追求的第一维度，体现为个体的“欲望”苏醒和自我解放，以此对抗官方儒学和现实政治的刻板管控。经由身体的自主寻觅心灵的解放，进而重建精神主体性，以实现“个人解放”，是陈映真的思考路径。“人们变换身体状况时也就改变了自己的思想。”^[41]在战后，台湾岛内的战争记忆和戒严，清除左翼和现代化等诸多议题压倒了文化启蒙，陈映真的身体书写所率先质询的便为上述内容。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以身体的解放寻找主体性，并接续五四启蒙精神。他对于裸露身体和苍白尸体的书写，有意识地抵抗意识形态的网罗与控制。“衣服是符号。它们也起约束作用。”^[42]身体

的裸露意味着拒绝被服装形塑，解构了政令、法规和习俗等意识形态对于身体的收编和改造。而生命结束的尸体则意味着回归纯粹，两种身体存有状态以摆脱权力遮蔽的方式回归了身体的本源存在。这种对于身体进行单纯化、朴素化的处理方式，实际是对文明世界虚假表象下内蕴的纲常、伦理和社会规训的挣脱。陈映真以身体的去蔽祛除了文明世界的阻碍，他对于裸露身体的书写，追寻的是对现代文明中诸种束缚的解除，是对于纯粹身体的期待，交织着对于抵抗的憧憬。经由“身体的自由”而走向“精神的解放”，是为寻找主体性的第二步。自杀的康雄白皙秀美似是被神化的尸体，没有世俗世界中对于尸体的恐惧，以此种干净和纯粹的状态彰显出生命结束时刻的尊严。而此种身体状态与官方的政策之间充满着博弈的拉扯，以私人性的身体呈现达到对于个人主体性的确认，是对威权时代辖制主体的对抗，并由此通向了文化启蒙。陈映真对于主体性的思考和抵达路径，正是如康雄等觉醒者对于自我身体的自由处置，体现为一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扬，即通过觉悟与自我启蒙而进行自主性的行为实践，进而认识真正的自己。这也是鲁迅所言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43]的知识分子，面对威权时代和不公现象之时所选择的抗辩方式，个人解放的五四启蒙精神于此处现身。

陈映真借由“身体”寻求主体性的第二维度，与秉持一生的左翼信仰关联密切，主体性探求又体现为政治抗辩之中的阶级解放。“人的解放，使人从物质的、精神的桎梏中解放，从压迫性的体制或人内在的罪恶与愚昧中解放。”^[44]这是左翼者陈映真所坚持的理想，内置着反对一切阶级分层与不公现实，并从根本上消除阶级存在的诉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本质一脉相承。阶级的存在衍生出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身体也随之被打上等级烙印。消除身体差异、寻求身体的平等便成为通向阶级解放的路径。“从有意识地建构世界的一刹那，身体的主体性就诞生了。”^[45]陈映真选择以不同阶层人物之间的爱欲关系，作为联通路径以打破藩篱并互通有无，实现阶级的解放。《某一个日午》当中，身处上层的房恭行与下层侍女采莲之间的“越轨”结合，便是陈映真以身体为通道，演绎阶级解

放的症候性故事。作为上层代表的房恭行与作为下层代表的采莲所孕育的孩子，意味着上层和下层之间阶级界限的打破，身体成为两个阶层之间的通道。房恭行对于下女彩莲“有强壮、有逼人却又执着的跳跃着的生命”^[46]的身体的迷恋，则预示着上层的负罪者势必在下层女性身体之中才能得到救赎。陈映真对于主体性探求的第二维度，表现为如房恭行一类的上层者和底层人物之间借由身体的互通与结合以达到的阶级解放。

陈映真以“内战-冷战”的双战构造概括战后台湾的社会性质。从“双战”的历史线条出发，主体性追求的第三维度体现为反奴性、反殖民与反新殖民的“民族的解放”。陈映真洞察到了身体所具有的强烈反叛性，以及在国族叙事中的重要指涉和站位，故选择以身体到心灵的路径，于“双战”的台湾社会结构之下，思考台湾如何走出殖民和政治宰制以寻获主体性的问题。陈映真借由对身体书写所投射出的反抗，直面台湾社会政治压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物化现实，在由“身”到“心”的实践过程中，借身体的解放演绎和寻找心灵的解放，观照整个台湾去殖民和反抗强权的历史，在廓清历史和寻获主体性的同时，超克了所谓的分离主义路线。“文学回到身体就是回到自己的来处、本源、创造者，就是回到自立的主体。身体是主体，是内蕴着感性和理性、欲望和远大理想、细小的计划和宏大蓝图的总体，是自我设计着的目的性存在。”^[47]在《夜行货车》中跨国公司的语境下，詹奕宏不驯服的身体便是一种民族野性和力量的体现。小说结尾处，詹亦宏向刘小玲发出的“跟我回乡下去”^[48]的呼唤，实为以身体在空间场域中的挪移，告别象征着西方与资本的跨国公司而回到象征着中国与民族的南方故乡。主体性于此处寻获并道成肉身，此结尾隐喻着反对新殖民的“民族的解放”。

对于陈映真而言，身体为一种穿越台湾 20 世纪诸多历史节点的装置，裸露的尸体或是感性的身体通向自我的解放道路。法令与现实辖制着身体，却进一步地使身体成为承载自我欲望的“小客体”，在作者视角介入的观看下，身体所表征的意义弥散开来，并成为主体性探寻的中介物。身体书写在反宰制与表达抗辩之后，由解放的身体到达自由的身

体，并在文化启蒙的诉求之中，左翼理想的信仰秉承之内以及“内战-冷战”的体制之下，超克了政治、资本等权力的宰制，在质询历史和寻获主体性的同时，对于台湾存在状态加以隐喻性的指涉。只是此种主体性并不能正面与权力进行强势碰撞，而属于一种于罅隙间闪转腾挪的寻找，这也是在禁忌时代其小说身体书写的意义所在。

陈映真曾直白说出自己为“文学工具论者”：“文学其实是表达我自己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包括政治在里面）的一个工具。”^[49]他借文学追溯事关个人和家国的创伤性历史，以进行心灵的疗愈并表达反叛和救赎。身体解除束缚后对于纯粹状态的回归，正是陈映真小说的精神线索和感觉结构的体现路径。还个人以自由并排拒文明世界中权力所给予不合时宜者的挤压，是为陈映真式的抗辩哲学。于彼时如铁屋子一般的台湾，作者令作为孤独个体的詹亦宏、康雄或是房恭行们以身体发声，在由“身”到“心”的主体性寻找过程中，陈映真发出对于五四启蒙的召唤，关注左翼式微的现实以及“内战-冷战”的台湾社会结构，显示出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双重关注。他的小说以隐形的呐喊超越时代和世代所设置的重重厚障，并将此融入台湾社会的整体感觉结构之中，抗辩之下隐藏着在时代夹缝挤压中坚守人道的知识分子的隐秘心灵史。他以对于“身体”的去蔽祛除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对于人的束缚，使身体从复杂的国族网格中挣脱出来，并借此寻找人之存在的主体性，也与战后台湾的现实情况及存在位置相呼应。

“革命，以一种乌托邦的冲动，推动着陈映真先生（以下敬称略）的思想进展，构成其精神展开的一翼。”^[50]这种革命意识无法真正地诉诸现实，陈映真便只能以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演绎身体的革命。陈映真对于身体的呈现偏于美学化的维度，对于身体审美化的有意突出唤醒了—种反叛的力量。“审美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唤醒的身体非常可能挣脱预设的观念之链而放纵暴烈的冲动——‘因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51]由爱欲、自戕等故事关键点可以体察作为书写主体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内心，并连缀出一条从“身体革命”到达“思想启蒙”的话语走向路径。这成为台湾威权时代中，

一种因隐性留存而被容忍的表述方式，身体作为感性因素的出场，被投射了理想受挫的自戕者、颓废者的隐秘内心诉求。在身体觉醒的过程中伴随着爱欲力比多的转移，爱欲正为理想颓败的一种补偿机制。启蒙的话语借助于感性身体的复苏而浮出历史地表，并经由身体使另一个世界敞开，祛除了社会权力组织性的遮蔽。身体的出场和回归自我本真，预示着人的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主体的发现和张扬，提示着力的发挥和精神的创造、反叛遮蔽的暗影以寻求“光亮”。身体的革命所体现出的感性力量灌注的启蒙，虽不同于康德式的对于“理性”精神的强调，但殊途同归于自我的发现乃至知性的独立运用，“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52]的诉求已经由身体的发现而得到实践。陈映真的小说借身体出场叙述故事，经由身体的革命发出深切的抗辩，进而在台湾文学场域中实践了“另类的启蒙”。

[1]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第1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感觉结构：此概念由雷蒙·威廉斯提出，他主张以“感觉结构”取代意识形态，认为：“感觉结构可以被定义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被定义为同那些已经沉淀出来的、更为明显可见的、更为直接可用的社会意义构型迥然有别的东西。”“大多数现行艺术的有效构形都同那些已经非常明显的社会构形，即主导的或参与的构形相关，而同新兴的构形相关的则主要是溶解流动状态的感觉结构。”参见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第14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复合渗透：此概念得自刘俊“复合互渗”概念的启发，在论及“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时，他认为其中存在着双边甚至多边的交互感应和复合渗透。“复合互渗”旨在描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状态。此处援引此概念指出在陈映真小说中，“爱欲”与“自戕”的复合渗透之下所形成的抗辩机制生成路径和存在状态。参见刘俊《世界华文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同体》，《香港文学》2013年第5期。

[4] 参见陈映真《台湾史琐论》，《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4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5] 《惩治叛乱条例》，转引自刘裕嘉《台湾史文献析论》，第393页，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

[6] 黄金麟：《战争与台湾的高等教育：1945—1990》，《台湾社会学》2017年第34期。

[7] 《后街》中充满了陈映真对于身体的记忆。外省客商被打倒在地，脚踝处浆着暗红的血迹；南洋战场复员且青苍着脸的吴老师，被军用吉普车带走；台北火车站门前柱子上“验明正身，名典正法”的告示；警备总部门前卑躬屈膝的老妇人，等待接见被关押的政治犯亲人；在台东泰源监狱中所见身体被束缚的五十年代心怀赤旗的一代人。身体成为陈映真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无意识关注的要点，并成为了其创作的核心生发点之一。参见陈映真《后街》，《陈映真文选》，第18—19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8][39]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文选》，第19页，第21页。

[9] 参见陈明成《陈映真现象》，“附录二”，第487页，前卫出版社2013年版。

[10] 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态》，李康译，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 “原质”为齐泽克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意为在符号核心当中无法被符号化和不能融入符号秩序中的创伤性因素。参见赵淳《不可言说的原质：斯拉沃热·齐泽克关键词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4期。

[12]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导言》，《美学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第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 陈映真：《面摊》，《将军族》，第6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14] 《中国近现代身体研究读本》，李蓉编，第2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 陈映真：《家》，《将军族》，第26页。

[16][17][18][19] 陈映真：《乡村的教师》，《将军族》，第28页，第31页，第35页，第39页。

[20] 李蓉：《现当代文学“身体”研究的问题及其反思》，《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

[21][22][48] 陈映真：《夜行货车》，《夜行货车》，第86页，第86页，第120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23][24] 陈映真：《铃铛花》，《赵南栋》，第37—38页，第51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25] 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第84页，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

[26]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文集：文

论卷》，第 397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27] 黄万华：《战后中国左翼文学的三种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史哲》2013 年第 3 期。

[28] 张妙璜：《台湾全志》，第 13 页，台湾文献馆 2009 年版。

[29] 刘奎：《陈映真小说的忧郁诗学与情感政治》，《文艺研究》2017 年第 9 期。

[30] 尉天骢：《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尉天骢对谈刘大任》，《回首我们的时代》，第 426 页，印刻出版社 2011 年版。

[31] 守常：《青年厌世自杀问题》，《新潮》第 2 卷第 2 号，1919 年 12 月。

[32] 李娜：《试析 1950—60 年代台湾青年的“虚无”，重新理解“现代主义与左翼”——以陈映真、王尚义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 年第 6 期。

[33] 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将军族》，第 18 页。

[34]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第 72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

[35] “隐微写作”概念由列奥·施特劳斯提出，他认为在一些时候人们公开讨论的“充分”自由会受到压制，人们的言论不得触及官方的观念，因而独立思考会遭受削弱。但是压制并不能阻止对于被视为是异端的真理的表达，一个人思虑周全便可采用“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不受到伤害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字里行间”的著述方式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作品中存有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前者处于前台，而后者则通过“字里行间”表现出来。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第 1—30 页，华夏出版社 2012 年版。

[36] 纪彭：《世界上最长的戒严令：后极权统治下的台湾》，《文史参考》2012 年第 13 期。

[37] 陈映真：《山路》，《赵南栋》，第 74 页。

[38] 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上册，陈光兴、苏淑芬编，第 58 页，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2011 年版。

[40] 陈映真：《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陈映真文选》，第 436 页。

[4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第 74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2]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第 3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4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6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44] 韦明：《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文集·文论卷》，第 36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45] 王晓华：《身体主体性的起源与审美发生论——主体论身体美学论纲之一》，《河北学刊》2009 年第 3 期。

[46] 陈映真：《某一个日午》，《将军族》，第 281 页。

[47] 王晓华：《主体缺位的当代身体叙事》，《文艺争鸣》2008 年第 9 期。

[49]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第 45 页。

[50] 张重岗：《陈映真与彼岸的“革命”》，《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左翼传统的复归》，吕正惠编，第 288 页，人间出版社 2008 年版。

[51] 南帆：《身体的叙事》，《天涯》2000 年第 6 期。

[52] 伊曼努尔·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 22 页，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罗雅琳